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12月1日 (第250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皮尤报告揭示美国公众的九大政治类型

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新的政治类型学研究，根据对公众态度和价值观的分析，将美国公众分为九个不同的群体。

中美关系

美对华仅建立“护栏”是不够的

美国胡佛研究所网站11月16日登载其当代亚洲项目杰出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R. Auslin）的文章称，拜登及其团队似乎接受了与中国进行合作性接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准则是“管理竞争”，安装“常识性护栏”，以避免武装冲突。但是，仅与中国建立“护栏”是不够的。

文章称，更重要的是，在一场竞争中，美国必须展开竞争。拜登政府必须拿出一个现实的计划，以保持交流，并切实推进美国的利益。这首先要认真审视美中关系中的最大风险，并诚实地评估美国能够并将对此做些什么。

首要的风险是台湾。对拜登来说，他必须决定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施压到什么程度，以及他是否真的会冒与世界第二大军队开战的风险。其次，在人工智能、超音速武器和5G等方面，拜登需要提出一个严肃的计划，确保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在下一代技术中的产业和技术竞争力。

美国政策制定者刚开始打破半个世纪以来从美中关系中看到“双赢”结果的习惯，但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问题是，美国是否有一个严肃的计划，来应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其能力最关键的考验。

美中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

美国《政客》网站11月23日登载斯坦福大学学者罗丝·高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的文章称，冷战为如何避免美中

核军备竞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上的第一次核军备竞赛为如何防止新的核军备竞赛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美中应避免试图限制新技术并专注于确保相互的核可预测性。因为在现实中，美中两国都有可能规避对新核技术的限制。而且在武器削减过程中，硬件项目可以被监控或销毁，而与武器相关的技术则不能。其次，耐心是关键，应准备好进行长期努力。控制和削减武器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美苏用了十多年才达成协议。

同过去与苏联的互动相比，美国与中国取得更快的进展应该是可能的。美国拥有足够多的核外交经验，而中国虽然是一个相对新的核竞争者，但参与了和美国的对话，并且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因此可以为该过程带来有价值的经验。俄罗斯也可以与中国开展稳定对话，以为这一进程提供帮助。

然而，美中关系没有美俄关系那么成熟，美中之间也不存在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对等关系。因此，不应期望中国一下子加入核裁军谈判中。相反，预计会有一个广泛的战略稳定议程。美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核现代化的目标，同时也愿意坦率地谈论自己的目标。美国的首要目标必须是避免一场军备竞赛。美中双方可以通过分享信息并消除对新技术的误解来加快谈判进程。譬如，双方可以讨论核指挥和控制中网络攻击的危险，导弹防御现代化或超音速导弹的影响等。而中国也可能愿意在其同美国能力更对等的领域参与对话，如天基资产。

美国应重新定义与中国的接触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网站 11 月 22

日登载前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的文章称，当前的地缘政治需要一种新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这种政策的驱动力不是希望改变中国，而是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必要性。

文章称，接触在阻止美中对抗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应该重新致力于接触，但要采取新的方式，以将一个日益全球化的议程纳入考量。如今，与中国接触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中并不受欢迎。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但这种立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接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够刺激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来改变中国，还在于它塑造了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阻止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对抗行为。

事实上，美中接触已经为预防冲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尽管还不充足。通过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接触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使两个经济体纠缠在一起。但是，尽管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可能有助于阻止对抗，但不一定会导致合作。

如今，超越国界的紧迫任务，如管理全球公共产品，正在定义地缘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美中采取一个面向解决全球问题和支持合作的接触框架至关重要。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理教授瓦乐莉·卡尔普拉斯（Valerie Karplus）提出了一种策略：在紧张时期拥抱低风险、高回报的合作机会，在关系更好时追求更具雄心的举措。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接触符合时代。但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美国将成为被在地缘政治上相关的中等强国包围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必须改变其做法，还意味着中等强国必须为管理中美竞争做出贡献。因此，接触必须成为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其他行为体行动起来。这将对国际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应对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美国在与中国冲突前需厘清四个问题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1 月 21 日登载国家利益中心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国家安全研究员苏曼特拉·梅特拉 (Sumantra Maitra) 的文章称, 美国就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前, 必须要回答四个问题:

第一, 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还是维持现状的大国? 美国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一个大战略? 如果中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 那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大国, 并在亚太地区拥有更高地位。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其利益也会随之扩大, 但只要中国愿意在既定框架内行事, 就不成问题, 除非美国全力追求获得首要地位的大战略。更大的风险在于, 美国从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转变为革命性大国, 致力于向整个亚洲输出意识形态。这样不仅会疏远印度等潜在合作伙伴, 还会造成与中国的冲突。

第二, 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如果美国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首要地位, 那么中美是不可能共存的。因为即使中国的实力有一点增长, 都可能威胁到平衡, 需要 (美国) 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纠正。这将意味着在必要时摧毁中国的力量。

第三, 美国所谓的摧毁中国在亚洲的力量意味着什么? 是瓦解中国政府和中共, 捍卫与促进民主? 还是与中国周边的盟友共同遏制和抵消中国的力量, 而不减弱其实力? 在前一种情况中, 台湾地区等重要问题可能会引发战争, 因为台湾既是防御单位, 也是实现制衡大陆这一最终目标的工具。如果答案是后者, 那么即使台湾落入大陆手中也无碍, 只要这意味着中国耗费 20 年时间安抚一个反叛省。即使没有台湾, 大陆仍将被日本、印度、越南和澳大利亚包围, 不会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格局。

第四, 美国人是否清楚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掀起战争的代价, 尤其是为了一个距离大陆沿海导弹炮台仅几英里远的地区?

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即使是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也能摧毁文明。美国人愿意冒着这么多伤亡的风险，为台湾开战吗？但是，更大的挑战不是与中国陷入核战争。大多数大国都深谙核摊牌的风险，因此都在为不足以构成战争的前现代冲突作准备。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西方的军事结构是否已经为这种“灰色地带”冲突做好了准备？在这点上，美国当前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科尔比：美如何用“拒绝战略”应对中国军事挑战

《外交事务》杂志 (FA) 网站 11 月 17 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克雷佩内维奇 (Andrew F. Krepinevich, Jr.) 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为应对中俄而提出的“拒绝战略” (strategy of denial)。

科尔比在其新书《拒绝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中阐述了美国新的国防态势。其战略侧重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目标，即防止一个敌对大国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该战略涵盖一系列主题，包括俄罗斯对北约构成的挑战，不稳定的中东和全球恐怖主义，但主要聚焦中国。

科尔比认为，大陆可能会试图对台湾等目标领土实施一种武装的“既成事实” (fait accompli) 战略。在军事战略中，“既成事实”是指一方在另一方进行有效防御之前迅速实现其目标的情况。这还意味着，一旦领土被占领，受害者及其盟友将认为夺回领土的代价极其高昂。科尔比认为，大陆对台湾的既成事实“入侵”可能会在亚洲造成一种新的现实。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阻止大陆对台湾或任何其他美国西太平洋盟友或准盟友实施“既成事实”战略的企图。如果威慑失败，它必须在攻击点 (point of

attack) 挫败这种企图。这就是科尔比提出的“拒绝策略”。

科尔比认为，如果大陆对台湾的“既成事实”战略成功，美国专注于“惩罚”的战略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如果美国选择升级战争的强度，冲突可能会从有限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双方可能会付出与任何潜在收益不成比例的代价。

阻止中国执行“既成事实”战略需要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首先，华盛顿需要在亚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了建立有利的军事平衡，美国还必须建立一个综合军事力量超过中国的“反霸权联盟”。科尔比呼吁的新联盟是一个国家联盟，包括美国的盟友和更广泛的地区伙伴。联盟的骨架应该由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盟友构成，并辅以更广泛的安全伙伴，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犹豫是否将越南纳入进来，他认为越南可能是该联盟一个有价值的成员，但也容易受到中国“既成事实”战略的影响。

科尔比指出，任何“拒绝战略”都必须现实地看待美国军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虽然面临留出资源应对其他全球威胁的诱惑，美国必须聚焦中国。如果到了紧要关头，美国必须全力应对中国。为了能有效、快速地做出反应，美国应扩大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并将美军分散部署到更多联盟国家中。

虽然，科尔比提出的“反霸权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威慑中国“侵略”，但他也认识到，如果威慑失败，就需要用武力对抗中国的“既成事实”战略。然而，美国及其盟友能否击退中国对台湾猛烈的进攻还远不确定。而且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不愿考虑一场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战争。

科尔比的策略也不是没有风险。到目前为止，随着美国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北约盟国几乎没有表现出填补针对俄罗斯战略空白的意愿。如果不将越南纳入“反霸权联盟”，科尔比认

为它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地区“扩张”的早期受害者，从而在“反霸权联盟”还未建立牢固基础之前就对它造成损害。

美国外交

美制裁使俄罗斯军售蒙受损失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11月18日发布该智库高级国际及国防事务专家约翰·帕拉齐尼(John Parachini)等执笔的报告称,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干涉和制裁能够迫使第三国重新考虑进口俄罗斯武器,“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已经使得俄罗斯军售蒙受了不少损失。

报告认为,一国能否响应美国号召拒绝进口俄罗斯武器取决于其军事体系结构,这些国家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武器装备大部分来源于苏联和俄罗斯武器系统的国家,例如越南和印度。这类国家要想摆脱俄罗斯,实现军备多样性存在巨大挑战。另一类是没有大量苏联和俄罗斯装备遗存的美国。若能够找到兼备经济适用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替代品,它们更容易拒绝进口俄罗斯武器。

基于此,报告建议:1)美国从战略层面综合考量制裁手段的使用,包括何时实施、何时豁免、何时反对制裁;2)美国需要与拥有大量苏联和俄罗斯武器,特别是与美国在关键领域存在利益交集的国家和政府展开战略谈判;3)美国、欧盟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基于对各国安全需求的考量,为替代俄罗斯武器提供可靠的外交和军事方案,并通过重塑外交叙事,将重点集中在俄罗斯的恶意行为,而非美国的制裁上。

美应支持“全球合作”而非“全球主义”

11月17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刊登其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撰写的文章，围绕新美国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安妮·斯劳特（Anne Marie Slaughter）的“全球主义”（globalism）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美国应支持全球合作，而不是“全球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斯劳特近日在一篇社评中称，拜登政府现有的外交政策对地缘政治存在过时的偏执，缺乏外交政策远见。她认为，战略竞争是上世纪冷战思维的残余，相反，美国应该推动具有“全球主义”的项目，以解决影响全球的问题。韦特海姆认为，在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国际背景下，斯劳特的观点很有吸引力。美国确实应该更新其外交政策，但“全球主义”可能无法提供美国外交政策目前所缺乏的准星，也无法实现她所希望的与过去政策的决裂。

那么，国家应该如何解决全球问题呢？韦特海姆表示，虽然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为美国的安全、自由和繁荣构成了巨大威胁，但将“全球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危险的。“全球主义”是将“人置于国家之上”，这恰恰忽略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服务于本国人。而“全球合作”的基础首先是考虑合作能否实现本国利益，其次才是关注他国的福祉发展。“全球合作”能够引起人们对权力和利益差异等现实因素的关注，而这恰恰是“全球主义”缺乏的。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时，最好先坦率地承认美国利益的优先级，再思考在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现实世界中与他国合作的必要性。

“民主峰会”应强调民主权利而非经济和地缘政治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发布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

斯·佩平斯基 (Thomas Pepinsky) 的文章称, 拜登政府即将召开的“民主峰会”应该专注于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和捍卫民主, 而非在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建立“二分法”。

文章称, “民主峰会”是美国在全球民主处于脆弱状态之际强调公民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和平异议的重要平台。但是, “民主峰会”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野心, 即组建全球民主联盟遏制和对抗中俄。尽管新老民主国家间确实存在共同利益, 但峰会的地缘政治野心恐以失败告终, 原因有二:

一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外交目标之间存在差异。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目标导向和务实的, 而非基于意识形态。俄罗斯同样能够基于一致的国家利益与任何一个民主或专制的政体合作。二是峰会无法回应全球民众关于民主与善治和经济效益之间联系的关切。即使民主国家的确更可能实现持续性经济增长, 但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撑该观点。相反, 1965 年以来的新加坡和 1986 年以来的越南等案例证明, 威权主义与国家繁荣之间并非不相容。对于许多民主状况堪忧的国家来说, 治理而非民主, 才是解决经济的关键。峰会若是执意将民主作为解决收入不平等、腐败和无效经济管理的解决方案, 将无法与目标受众国产生共鸣。

“民主峰会”的重点应该是, 确定民主面临的威胁, 并通过投资信仰自由、动员自由和异议自由来加强现有政权。在两党极化的背景下, 这项工作应始于美国国内。

联盟及伙伴关系会让美国陷入冲突吗?

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否会使美国卷入冲突甚至战争? 一些战略家认为, 这些安全关系导致美国将其伙伴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 促使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做出提高冲突可能性的、不计

后果的行为，导致美国冒着被拖入冲突的风险保护其履行承诺的声誉。其他战略家则认为，美国只要将自身利益放在心上，限制盟友和伙伴做出危险行为，就能避免卷入冲突。

兰德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描述了与之相关的“卷入风险”（entanglement dynamics）。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得出，卷入因素导致美国介入了冲突，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现有文献显示，美国卷入两场台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的信誉受到威胁。对美国在盟友、合作伙伴和对手中的信誉的担忧，似乎促使美国参与了这些危机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卷入因素促成了美国的干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并不总是卷入涉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如苏伊士危机），美国选择不支持参与了与美国利益相悖的冲突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这一复杂的情况表明，需要对美国的卷入因素进行更多研究，以确定其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它们何时最有可能出现。决策者和公众必须确立规范，确定如何权衡这些风险以及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带来的其他成本和收益。

第二，美国过去曾试图阻止盟友和伙伴挑起冲突，有成功也有失败。支持美国在海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人士认为，联盟和伙伴关系赋予了美国限制其他国家使用武力的影响力。然而，资料显示，虽然美国在某些情况下限制了其盟友和伙伴的危险行为，但在其他情况下，美国未能控制其盟友和伙伴。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因为美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是因为它不愿行使这种影响力。

第三，学者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美国陷入战争的案例。虽然证据表明卷入现象比较普遍，但报告尚未发现美国为了保卫一个因依赖美国承诺而冒险发生冲突的盟友而开战的案例。美国陷入除战争之外的冲突的频率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四，美国过去曾与野心勃勃的国家结盟，但试图通过附加条件来降低“卷入风险”。美国领导人至少两次与他们认为带来较高陷入风险的国家结盟。在这些情况下，美国试图通过设定防御条件来降低陷入风险。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条款是否如美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帮助美国降低了“卷入风险”。

第五，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联盟不会导致大多数盟友采取带来冲突风险的政策，但仍可能导致个别国家采取此类政策。然而，全球范围内关于联盟的广泛文献表明，参与有条件防御联盟（美国参与的联盟均属于此类联盟）的国家在争端中采取初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比没有参与联盟或参与其他类型联盟的国家要小。这一发现称，参与有条件防御联盟的国家挑起冲突的可能性更小，或者会在挑起冲突时受到伙伴的约束。然而，报告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美国提供的保护可能会导致个别盟友和伙伴更可能冒险发生冲突。

美国政治/其他

布鲁金斯学者分析美当前的通胀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1月16日登载其经济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温迪·埃德尔伯格(Wendy Edelberg)的文章称，导致当前美国通胀的因素将随着疫情好转而得到控制，未来最大的风险在于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服务业复苏的需求和高昂的房价。

文章称，当前通胀的原因在于疫情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程度和构成发生变化，以及供应限制。虽然核心商品预计未来几年不会继续异常通胀，但另外两个问题更可能在未来造成新的通胀：服务业部门劳动力供求失衡和近期的房价上涨。

首先，随着消费支出向服务业重新平衡，消费者对休闲度假服务的需求恢复到乃至超过疫情前的程度，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急剧上升。然而，当前劳动力参与率低，求职者与岗位匹配的速度缓慢。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这将影响美国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增加既定总需求的通胀压力，乃至降低生活水平。其次，房价上涨及其对租赁市场的溢出效应。房价增长和租赁市场的通胀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但是，房价和房租的通胀将更像是普通形式的通胀，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能加以抑制。

未来通胀的最大风险是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服务业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增长。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鼓励劳动力供应：通过疫苗和明智的卫生政策控制疫情；解决造成工作成本高的障碍，例如提供可负担的、高质量托儿服务；通过绿卡发放等方式使移民数量恢复到正常水平，补充美国的劳动力。

如何彻底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网站 11 月 23 日登载该委员会国际经济学杰出研究员罗杰·弗格森 (Roger W. Ferguson Jr.) 等合著的文章称，虽然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可能是暂时的，但其应该促使美国采取行动解决一些长期困扰供应链的系统性问题，以便全球供应链更好地抵御未来的冲击。文章摘要如下：

交通和仓储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压力。企业应该为货车司机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工资，政府应对改善运输和航运工作环境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制造业通常采取准时化 (Just-in-time mode) 模式，即在刚好的生产时间订购足量的组件，从而降低过剩库存和仓储成本，提高利润。但这在提高供应链效率和速度的同时，也失去了

弹性，带来风险。因此，企业应重新考虑准时化模式，保留库存以提高供应链弹性，哪怕这意味着牺牲短期利润。

疫情也使美国供应链多元化和对华依赖问题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但美国应该现实地评估其回迁制造业的能力，以确保供应链的弹性。鉴于美国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美国可能仅有能力回迁技术先进的研究密集型生产，而无法在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领域竞争。将供应链就近迁移到墨西哥等周边国家既可以减少对华依赖，也可以缩短一系列产品供应链。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是供应链中无法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目标不应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而是使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

最后，大多数公司对供应链的理解是不完整而分散的，并且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对此，企业应该进行数据分析，推动对供应链风险的理解和管理；借助现代工具，采用正式的供应商风险管理政策，不仅要发展成本最低的供应链，更要发展能够根据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调整的最优供应链。

自动化与美国的激进主义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11 月 22 日登载其富布赖特学者朱利安·雅各布斯（Julian Jacobs）的一项研究称，职业最有可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美国人往往对政治、经济、媒体和人性持悲观和愤世嫉俗的观念。文章摘要如下：

职业最有可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美国人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在经济议题上左倾，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稍微右倾。他们大体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自 2000 年以来逐渐向共和党靠拢。他们通常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对世界和政治深感悲观，也有可能投票反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观念上变得更加威权主义。

西班牙裔、黑人和亚洲人是最有可能从事可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工作的人群，女性从事此类工作的可能性也稍高。除此之外，南方普通工人被自动化替代的可能性更高，他们通常属于收入分配最低层三分之一的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常持以下观点：

第一，该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往往更低，他们不太支持媒体，对政治的本质和他们发声的力量更加悲观。他们略微偏向民主党，但这种偏好正在减弱。自 2000 年以来的几年里，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已经低于民主党在全体选民中的平均支持率。这表明，随着政治冷漠加剧，政治参与度持续下降，该群体在过去 20 年可能逐渐远离了民主党。

第二，该群体表达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恐同或性别歧视的可能性自 2000 年以来提高了 5%。这种不容忍的增加在更具体的种族敌意种类中更加明显。

第三，该群体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支持程度较低，但总体比一般美国工人阶级持更左倾经济观点。自 2000 年以来，该群体在文化上也略显保守。他们更有可能对人性持愤世嫉俗的观点并表达威权倾向，相较于个性和表达，他们更看重服从。

第四，该群体里的美国白人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一个不同是，相比于民主党候选人和自由派，他们稍微偏向共和党候选人和保守派。与不易受自动化影响的美国白人相比，易受影响的白人更可能对个人生活持悲观态度，更可能反对移民和国际贸易。

研究结果显示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中的三大重要趋势：首先，易被自动化替代的个人具有一套独特的信仰和特征。其次，他们更有可能持有符合其利益的进步性经济观念。最后，该群体正变得更绝望，更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人，反对进步的经济议程。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群体最可能受到技术变化引起的劳动冲击，越来越多地基于文化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投票。如果该论

点成立，这或许会证明，随着文化之争主导公共辩论，美国工人阶级中有显著数量的人已经离开了民主党。因此，进步的经济政策和保守的文化政策相结合可能最能够吸引这些人。

皮尤报告揭示美国公众的九大政治类型

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新的政治类型学研究，根据对公众态度和价值观的分析，将美国公众分为九个不同的群体。

四个亲民主党的群体凸显了民主党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以及当前民主党联盟的庞大和复杂。这些群体包含两个非常不同的自由派民主党群体：**进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和**建制自由派**（establishment liberals）。进步左派是民主党中唯一一个白人占多数的非西班牙裔群体，他们对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持有非常自由的观点，并支持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以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扩大社会保障网。尽管建制自由派在许多方面与进步左派类似，但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变革。

民主党联盟的另外两个群体截然不同，无论在人口统计学上还是在与民主党的关系上。**主流民主党人**（Democratic Mainstays）是最大的亲民主党群体，也是平均年龄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在一些问题上持温和倾向。**局外人左派**（outsider left）是最年轻的群体，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持非常自由的观点，但他们对政治体系——包括民主党及其领导人——深感失望。

四个亲共和党的群体包括三个保守派群体：**信仰和旗帜保守派**（Faith and Flag Conservatives）在所有领域都非常保守；他们最有可能说，政府政策应该支持宗教价值观，政治上妥协是

“出卖信仰”。坚定保守派 (committed conservatives) 也表达了全面的保守观点，但在移民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上，他们的立场稍微温和一些。民粹主义右派 (populist right) 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低于大多数其他群体，是最有可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群体之一，对移民和美国大公司都持高度批评态度。矛盾右派 (ambivalent right) 是与共和党联盟中最年轻、最不保守的群体，他们在政府规模、经济体系以及种族和性别问题上持保守观点。但他们是右派中唯一一个支持合法堕胎的人占多数并认为娱乐和医疗用途大麻应该合法的群体。

唯一没有明确党派取向的类型学群体——焦虑的观望者 (stressed sideliners) ——也是政治参与水平最低的群体。焦虑观望者占公众的 15%，但在 2020 年只占选民的 10%，他们既有保守的观点，也有自由的观点，最大的特点是对政治的兴趣极小。

皮尤研究中心新的类型学研究还为了了解美国人如何看待种族不公正、政府规模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提供了洞见：一是种族不公正仍然是美国政治的分界线。二是亲民主党群体压倒性地支持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服务，而共和党群体压倒性地支持小政府。三是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让共和党产生分化。民粹主义右派与传统共和党人截然不同，前者对企业持非常负面的看法。大多数民粹主义右派支持对家庭收入超过 40 万美元的家庭增税，42% 的矛盾右派（以及所有亲民主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持同样看法。四是不同群体对美国全球地位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五是成立第三大政党具有广泛的支持。然而，类型学研究发现，自认为是无党派人士的人占比最多的三个群体——焦虑观望者、局外人左派和矛盾右派——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共同点。这些群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政治的兴趣相对较低。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